

从“中国人必须走”到“中国病毒”

——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历史根源

刘 丛 谢 斌 薄诗雨*

摘 要：本文研究 19 世纪美国社会的“排华”行为对当今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长期影响。利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推特中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一事件，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结合谷歌搜索的日度数据和电子化的历史档案，发现历史上曾发生过较多排华事件的地区当下“中国病毒”的谷歌搜索频次更高，说明了排华态度的长期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受到中国商品进口冲击更大和亚裔人口比例更低的地区，排华态度的持续性更强。

关键词：文化持续；国际关系；媒体

DOI: 10.13821/j.cnki.ceq.2023.02.19

一、引 言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我国在付出巨大努力后已经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依然错过了最佳窗口期，导致疫情迅速扩散。面对严峻形势和民众谴责，一些国家政府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到率先发现病毒传播的中国身上。当地时间 2020 年 3 月 16 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公共社交网络平台推特（Twitter）发言中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原文为“Chinese virus”）。由于这一表述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病毒命名应避免出现特定地区或人名”的原则，也并非美国卫生部门当时的惯用表述“冠状病毒”（原文为“coronavirus”），而是特朗普本人有意使用的称谓，旨在将疫情归咎于中国，具有强烈的反华色彩。这条推特的发布迅速引起巨大争议，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和批评。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美国民众竞相效仿，使用这一称谓来表达他们排斥中国和华人的立场。

本文利用美国民众在互联网上效仿特朗普的措辞来表达排华情绪这一现象，探讨美国社会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的排华态度是否仅仅是当下特定形势的产物，还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通过结合历史档案数据和互联网搜索数据，本文使用定量方法考

* 刘丛、谢斌、薄诗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谢斌，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510632；电话：(020) 85225001；E-mail: xiebinecon@outlook.com。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273053、71803113、71904063、71803064）、北大-林肯中心年度研究基金（FS02-20211215-BSY）、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GZGJ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JNTZ16）的资助。作者感谢主编与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以及范骏琪、韩潇和杨世宁优秀的助研工作。

察美国当今的排华态度是否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排华观念,并讨论在百年前形成的观念如何存续至今。美国的排华观念肇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自 19 世纪中叶起,上万华人劳工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谋生。工作岗位的竞争和种族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招致了美国民众的歧视和排斥。在工会和政客的推波助澜下,美国国会于 1882 年通过《排华法案》,全面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各州也相继出台歧视华人的法律。对华人的制度歧视进一步纵容和鼓励了民众的排华情绪,各地的排华事件更为频发,手段更加恶劣,对华人的大规模驱逐、攻击乃至屠杀频频出现。在《排华法案》生效的 60 余年中,华人在美国受到严重歧视,成为极端边缘化的群体。尽管在 20 世纪后半叶,华人再度开始大量移入美国并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但这段排华历史仍然存留在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并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被重新提起。

在本文中,为了构建当今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指标,我们搜集了特朗普首次使用“Chinese virus”当天(2020 年 3 月 16 日)前后各一周内,美国各地在谷歌搜索(Google)中对“Chinese virus”的日度搜索频率指数。¹同时,我们从 Pfaelzer(2007)中搜集了 1880—1889 年间美国排华事件的记录。横截面回归结果显示,历史排华事件更多的地区居民更倾向于在谷歌中搜索“Chinese virus”。为了提高因果识别的可信度,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相对于历史排华事件较少的地区,历史排华事件较多的地区在特朗普发布推特后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显著增加。当每百万人历史排华事件数增加 1 个标准差时,“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会增加约 0.20 至 0.23 个标准差。而这一搜索量的差异在推特发布前没有出现,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为了证明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量合理衡量了排华态度,我们使用了对墨西哥裔移民的歧视词汇以及特朗普在同日推特中提到的其他人名的搜索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发现这些词汇和人名的搜索量与历史排华程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此外,我们发现推特发布后,历史排华更严重的地区居民还会更频繁地搜索特朗普未曾使用的对华人的歧视性称谓,说明这些地区确实存在更为强烈的排华情绪,而非仅仅更关注特朗普的言论。

为了考察历史排华态度在长期中传递的原因,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了不同地区特征对于排华持续性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历史亚裔人口比例对排华态度的持续性没有影响,但当代亚裔人口比例较低的地区则有更强的持续性,这说明当下和华裔居民的接触与交流可以减弱排华态度的延续性。其次,我们并未发现排华态度在收入较低地区的长期持续性更强,但在受到中国商品进口冲击更大的地区排华态度的延续性更强。这说明,经济萧条地区并不天然有更强烈的排外情绪,但是当经济衰落被更多地人为归咎于中国时,历史上对华人的负面态度更易延续。我们搜集的大量媒体报道也对这一发现提供了定性证据:在当下华人较多的地区,本地居民与华人的交流更密切,因而媒体报道与访谈对华人表露出更为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在当下华人较少的地区,居民更容易因新冠疫情指责华人。这说明,各个族裔之间的接触有助于消弭对某一群体的排斥和仇恨情绪(Glaeser, 2005)。

本文提供了历史文化观念在长期中存续的实证证据并探索了其传递机制,这与文化

¹ 以往研究表明谷歌搜索指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衡量美国民众对各类争议事件与人群的真实态度,如 Stephens-Davidowitz(2014), Anderson et al.(2020), Lu and Sheng(2022)。

经济学的前沿文献紧密相连。Voigtländer and Voth (2012) 考察了中世纪德国的反犹情绪与 20 世纪纳粹兴起之间的关联，并归因于社会环境过于闭塞。Grosjean (2014) 发现，由于美国南方较弱的正式制度，苏格兰移民后裔传承了早期移民的暴力文化，因而导致了南部地区更多谋杀的发生。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 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考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延续方式，认为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Giuliano and Nunn (2021) 发现，如果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化的持续性会更强。本文通过研究美国社会排华态度的持续性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并考察其影响因素，为这支文献增添了新的实证证据，并且对文化传统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有少量的经济学研究探讨了《排华法案》对华人迁移和融入的影响。Carter (2013) 发现华人在排华期间从美国西部大量移居到中东部；Chen (2015) 发现《排华法案》导致华人的选择性移民；Chen and Xie (2020) 发现《排华法案》使得华人经济融入更为困难。历史和社会学者也对排华运动的产生原因及后果有所研究。² 我们的研究探讨历史上的排华对当今美国社会的长期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这支文献。

我们的发现对于研究本土居民对待移民和少数族裔态度的文献亦有贡献。经济学文献一般认为，移民是否对本土居民的经济地位造成冲击是影响本地民众对移民态度的主因。例如，移民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发生竞争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或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 (Dustmann and Preston, 2007)，从而导致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排斥态度。政治心理学则强调社会心理因素，例如民众是否认为移民会造成社会问题或对国家认同构成威胁 (Sniderman et al., 2000)、民众对移民的刻板印象以及媒体对移民的报道方式 (Hainmueller and Hangartner, 2013)。最新的经济学研究关注社交媒体煽动排外的作用 (Bursztyjn et al., 2019; Müller and Schwarz, 2021)，与本研究的内容有相通之处。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民众态度，本文则探索历史上形成的态度观念如何在长期中延续。值得一提的是，Glaeser (2005) 通过模型刻画了政客如何为了选举散播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言论。该模型提出假说：当民众接触少数族裔的机会越少，对仇恨言论的验证成本就越高，从而越容易盲从。本文发现历史排华态度在华人较少居住地区的持续性更强，为该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

此外，不少研究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如宗族、儒家、方言）的传承对当代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一方面，宗族文化对创业、私营经济、养老和灾荒救济均有正面作用 (Zhang, 2019, 2020; Cao et al., 2022)。另一方面，宗族文化也加剧了性别比失衡 (张川川和马光荣, 2017) 和流动人口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概率 (陈斌开和陈思宇, 2018)。儒家文化则对人力资本和创业有正面作用 (冯晨等, 2019; 张川川等, 2019)。刘毓芸等 (2015)、高翔和龙小宁 (2016)、刘毓芸等 (2017)、丁从明等 (2018a) 以及高超等 (2019) 等研究发现各地方言文化的差异导致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耕作模式 (丁从明等, 2018b) 和方言 (黄玖立和刘畅, 2017) 也会影响地方社会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王艳和李善民, 2017; 曹春方等, 2019)。与关注传统文化在中国内部的持续性影响的文献相比，尽管华人向海外移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Kuhn, 2008)，但是考

² McClain (1994) 梳理了华人在排华期间利用法律、外交、舆论等手段进行抗争的历史；Lai et al. (1991) 整理了排华期间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的华人留下的诗作和口述史；Pfaelzer (2007) 梳理了排华暴力运动的历程和规模；Lew-Williams (2018) 考察了 19 世纪美国排华观念产生以及《排华法案》出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

察海外华人对他国文化影响的研究仍然有限。本文通过研究美国排华历史的长期持续性,揭示了华人移民对塑造其他国家社会文化和当下国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美国的排华历史和特朗普推特事件;第三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包括方法介绍、基准结果、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背景

(一) 美国排华历史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至中国,部分华人开始追随淘金潮前往美国谋生。华人移民的人数从1850年的450人迅速攀升至1852年的20 026人,之后每年稳步增加数千人。1870年,华人占加州劳动力的比例已达25%。

早期华人移民为美国西进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他们对工资要求不高且工作勤勉,非常受雇主欢迎。面对激烈竞争,白人劳工将矛头指向华人,指责他们抢占工作机会并压低工资,并开始有组织地歧视和排斥华人。加州工会工人党的领导人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在全国进行排华的宣传和游说,其宣传语“中国人必须走”成为排华运动的代表性口号。出于政治利益,西部州的政客也开始在国会中强调华人的种族和文化差异,鼓动立法排斥华人移民。在劳工领导和政客们的政治游说和宣传攻势下,美国国内排华情绪高涨。

1882年,美国政府公然违背《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对两国移民不应设限的条款,通过《排华法案》全面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并剥夺了华人入籍的权利。《排华法案》使得每年华人合法移民人数下降三成以上,在美华人数从1890年的10.7万人下降至1910年的7万人。白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欺凌也愈发有恃无恐,排华事件频发,进一步恶化了在美华人的处境。据统计,仅1885—1886年就有至少168个社区发生了排华事件,造成85人死亡,无数华人劳工被迫离开自己定居的城镇(Lew-Williams, 2018)。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市的屠杀事件造成至少28名华人死亡,是美国排华历史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排华行为对在美华人造成了严重伤害,使他们长期处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择业与生活。在美华人坚持不懈地利用法律和舆论武器进行抗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虽然《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废除,但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并未迅速得到改善: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不少华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随意调查、传讯乃至迫害。直至7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华人移民的再度大量涌入,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才重新站稳脚跟。

(二) 新冠疫情与特朗普推特事件

新冠病毒于2019年年底首先在武汉被发现,并于2020年2月1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CoV-2”,引发的疫情被命名为“COVID-19”,并陆续被全世界采用。

美国于1月20日报告了第一例病例,此后数周病例没有显著增加。美国早期的报道

虽提及了病毒首先在中国发现，但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在称呼上直接将病毒与中国相联系。³而后，美国的病例数自3月起迅速攀升。当地时间2020年3月16日傍晚5点51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推特中发言称：“美国将重点保护受到‘中国病毒’影响的产业”⁴。这一发言是特朗普在总统任内首次公开将新冠病毒直接指向中国，迅速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上引发极大争议。⁵此后，特朗普也多次在推特发言和其他公开场合使用这个称谓，说明其并非一时措辞不当，而是刻意为之。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这一事件展开了激烈辩论，美国主流媒体就此也进行了深入报道。批评者认为这一称谓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对“病毒命名应避免出现特定地区或人名”的一贯原则，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反华倾向；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亦公开表态拒绝使用这一称谓。另一方面，也有诸多美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援引“Chinese virus”这一提法表达对中国的负面态度。“Chinese virus”一词在互联网上成为热点话题；谷歌搜索的汇总数据（图1）显示，在推文发布的后一天，即3月17日，美国国内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量激增至3月16日的13倍，并于之后的两天持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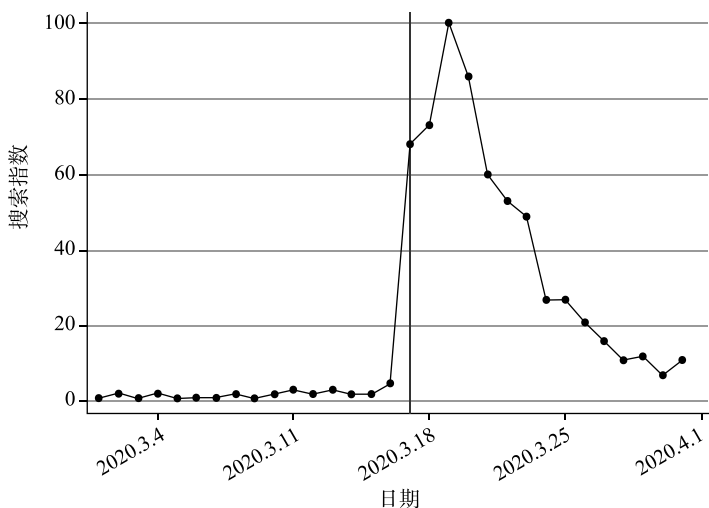


图1 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Chinese virus”总搜索量趋势

数据来源：谷歌搜索趋势。

新冠疫情在美爆发后，美国街头已零星出现辱骂骚扰华人的事件。而在特朗普发布推特后，在美华人遭受歧视的事件急剧增加。据 Stop AAPI Hate 网站统计，自3月19日起的一个月内，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歧视事件总计1497起，遍布美国本土45个州。一些华裔在受访时提及此次事件让他们想起了华人被歧视的过往和伤痛经历。

³ 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早期报道将疫情的源头与SARS或MERS相联系，并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采取的措施。

⁴ 原文为“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powerfully supporting those industries, like Airlines and others, that a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e Chinese Virus. We will be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⁵ 美国总统的官方推特账号为“@POTUS”，但由于特朗普的个人账号（@realDonaldTrump）颇具影响力，在其总统任内“@POTUS”账号的内容基本为转发特朗普个人账号的推特。

三、数 据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档案和当代网络搜索数据,考察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负面态度是否与美国 19 世纪末的排华行为相关。分析使用的关键数据包括美国 1880—1889 年间发生的排华事件记录以及特朗普推特发布前后一周内“Chinese virus”在各地每日的谷歌搜索量。我们也收集了当下美国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并收集了对应的历史信息用于异质性分析。

我们将 Pfaelzer (2007) 收集的 1880—1889 年美国各地排华事件记录在地区层面进行数量加总。该数据集包括了针对华人进行的抵制、示威、驱逐、纵火、私刑等一系列歧视事件,是已知对 19 世纪末美国排华记录最为详细的系统性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大部分排华事件发生在当时华人聚集较多的西部。

我们利用谷歌搜索趋势 (Google Trends) 提供的“Chinese virus”的日度搜索数据来度量当下美国各地区对华态度的负面程度。谷歌提供了美国每个都会区每天内对任意词组的搜索指数。该指数反映的是每个地区使用谷歌搜索引擎对特定词组的搜索频次⁶。对某一词组,某日内搜索该词组最多的地区的搜索指数为 100,其他地区以此为基准计算出相应指数,完全没有搜索的地区指数为 0。我们利用该指数度量搜索频次在所有地区的相对强弱。为了剔除每个地区对疫情本身关注程度差异的影响,本文搜集了同时段内“coronavirus”的搜索指数,最终使用的因变量是每个地区“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减去该地区“coronavirus”的搜索指数(称其为“简单标准化”)。由于简单标准化处理可能导致地区间指数量纲的较大差异,为了确保标准化后的指数在各地区间可比,我们对简单标准化的搜索指数进行进一步加权,即使用“(“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coronavirus”的搜索指数)÷“coronavirus”的搜索指数作为回归的因变量(称其为“加权标准化”),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作为控制变量,我们从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和 2016 年总统选举数据中搜集了每个县 2010 年的人口数量、亚裔比例、产业结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在 2016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并从 Autor et al.(2013) 中搜集了 1999—2007 年每个通勤区受到中国进口商品冲击的程度。对控制变量的选择出于以下考虑:首先,民众对华人的态度可能会受到当地华人人口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每个地区的亚裔人口比例。其次,居民的教育和收入状况可能会影响对移民的态度 (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4),因此我们控制了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以及贫困率、失业率、基尼系数和产业结构。再次, Autor et al.(2013) 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商品出口造成美国制造业地区衰退和居民经济状况恶化,受影响地区居民从而可能产生更负面的对华态度,我们因而控制了各地区受到中国进口冲击的程度。最后,我们控制了 2016 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因为特朗普支持者的对华态度可能受到其对华政策的直接影响。

⁶ 谷歌搜索趋势提供的搜索频次已使用该地区的总搜索量进行标准化,所以我们并未另外控制各地的总搜索量。

为了考察影响地区排华态度持续性的因素，我们利用美国全人口普查历史微观数据 (Ruggles et al., 2020) 计算了 1880—1940 年每个县的亚裔人口比例、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并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县级人口统计制表中搜集了 1960—2000 年每个县的亚裔人口比例。

为了保证分析单位的一致性，我们将上述县级或通勤区级变量加总至与谷歌趋势数据相同的都会区层面。表 1 报告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来源
“Chinese virus” 的搜索指数：(1)	204	43.446	14.842	0	100	a
“coronavirus” 的搜索指数：(2)	204	70.353	7.922	49	100	a
简单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1)－(2)	204	－26.907	15.676	－100	36	a
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1)－(2)] ÷ (2)	204	－0.380	0.212	－1	0.563	a
历史排华事件数量（每百万人）	204	2.543	19.851	0	265.528	b
总人口自然对数	204	12.931	1.344	9.077	16.098	c
亚裔人口比例（%）	204	2.444	2.582	0.150	24.845	c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支持率（%）	204	22.406	6.806	0	41.401	c
贫困率（%）	204	14.217	4.516	6.600	35.200	c
失业率（%）	204	7.730	2.581	3.200	27.500	c
建筑业占就业人口比例（%）	204	10.153	1.942	5.850	15.800	c
制造业占就业人口比例（%）	204	13.411	3.697	6.650	25.500	c
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204	85.885	5.444	61.600	96	c
基尼系数	204	0.439	0.024	0.385	0.516	c
中国进口冲击指数	204	3.364	2.982	0	26.775	d

数据来源：a 为谷歌搜索趋势；b 为 Pfaelzer (2007)；c 为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和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数据；d 为 Autor et al.(2013)。

四、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使用横截面回归考察历史排华事件更多的地区居民是否更频繁地搜索“Chinese virus”。鉴于横截面回归可能面临遗漏变量的问题，我们随后使用日度搜索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推特发布前后“Chinese virus”在各地的搜索量是否有显著变化，进一步确立两者的因果关系。

（一）横截面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考察特朗普发布推特后一周（3 月 16 日至 3 月 23 日），“Chinese vi-

rus”在不同地区的搜索指数是否受到历史排华事件数量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Index_{is} = \alpha + \beta_1 \times Expul_{is} + \beta_2 \times Controls_{is} + \gamma_s + \epsilon_{is},$$

其中 $Index_{is}$ 是处于 s 州的都会区 i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Chinese virus”从3月16日至3月23日的总搜索指数。 $Expul_{is}$ 是该都会区每百万人口的历史排华事件次数。 $Controls_{is}$ 代表该都会区的各社会经济特征, γ_s 代表州级固定效应。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第(1)列至第(3)列使用简单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第(1)列的回归中仅包含关键自变量,其估计系数显示,当每百万人历史排华事件数量增加1时,“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会增加0.1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2)列回归加入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缩小至0.0637。第(3)列回归进一步控制州固定效应,估计系数减小为0.0423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表明当历史排华强度增加1个标准差时,“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会增加0.054个标准差。在第(4)列中,我们使用了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历史排华强度增加1个标准差会使搜索指数增加0.057个标准差,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3)列和第(4)列显示,两种标准化处理方式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表 2 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基准回归分析

因变量	以下关键词的搜索指数				
	Chinese virus 简单标准化		Chinese virus 加权标准化	coronavirus 原始	
	(1)	(2)	(3)	(4)	(5)
每百万人历史排华事件数量	0.105*** (0.0160)	0.0637*** (0.0135)	0.0423** (0.0186)	0.000603** (0.000252)	0.000749 (0.0179)
总人口(对数)		3.674*** (0.835)	3.094** (1.164)	0.0445*** (0.0155)	0.411 (0.590)
亚裔人口比例		1.602*** (0.457)	1.764*** (0.398)	0.0291*** (0.00524)	0.179 (0.271)
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0.247 (0.258)	0.273 (0.339)	0.00623 (0.00469)	0.206 (0.160)
贫困率		-0.949* (0.563)	-0.446 (0.678)	-0.00542 (0.00892)	-0.0318 (0.223)
失业率		-0.262 (0.371)	-0.145 (0.544)	-0.000731 (0.00663)	-0.117 (0.329)
基尼系数		134.0** (65.89)	108.2* (61.84)	1.840* (0.944)	57.86* (30.06)
建筑业占就业人口比例		0.288 (0.499)	0.388 (0.621)	0.00862 (0.00823)	0.337 (0.265)
制造业占就业人口比例		0.0656 (0.328)	0.0215 (0.380)	-0.00110 (0.00610)	-0.0393 (0.185)

(续表)

因变量	以下关键词的搜索指数				
	Chinese virus		Chinese virus	coronavirus	
	简单标准化		加权标准化	原始	
	(1)	(2)	(3)	(4)	(5)
中国进口冲击		-0.185	-0.476*	-0.00536	0.252
		(0.375)	(0.272)	(0.00480)	(0.162)
特朗普支持率		-0.597***	-0.415**	-0.00341	0.263***
		(0.158)	(0.197)	(0.00278)	(0.0909)
观测值	204	204	204	204	204
R^2	0.018	0.568	0.721	0.712	0.746
州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聚类在州层面的标准误。***、**、*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历史排华地区居民是否是因为更关心疫情状况，所以搜索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更高呢？首先，我们使用的是经过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这已经排除了各地区对疫情关注程度可能存在的差异。此外，第（5）列使用“coronavirus”的原始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得到的估计系数接近于 0 且不显著，说明历史排华程度不同的地区在对疫情本身的关注程度上没有明显差别。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看，亚裔居民较多的地区在短期中表现出更强的排华态度。反映经济状况的变量中仅有基尼系数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收入不平等地区的排华态度更为强烈。中国进口冲击指数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某地居民受到的对华贸易冲击和其对华态度在短期中不直接相关。此外我们发现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和因变量负相关，这说明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不应简单视作当下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更凸显了考察其历史成因的重要性。

（二）双重差分模型

由于横截面回归可能会出现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例如，历史排华地区更多使用“Chinese virus”这一表述可能源自当地的语言习惯），我们用 3 月 16 日前后一周每天的谷歌搜索指数构建了面板数据，使用如下双重差分模型来进行因果识别：

$$Index_{ist} = \alpha + \beta_1 Expul_{is} \times PostTweet_t + \beta_{2t} Controls_{is} \times Date_t + \gamma_s \times Date_t + \theta_i + Date_t + \epsilon_{ist},$$

其中 $Index_{ist}$ 是处于 s 州的都会区 i 在 t 天“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 $PostTweet_t$ 是代表推特发布后的虚拟变量。 $Date_t$ 是日期固定效应， θ_i 是都会区固定效应，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的含义相同。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州与日期的固定效应，两者的交互项，以及横截面控制变量与日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该模型中， β_1 衡量了推特发布后历史排华事件对搜索指数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格的上下分别使用“Chinese virus”的简单标准化和加权标准化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第（1）列的回归样本包含 204 个都会区

在推特发布当天和前一天的观测值,第(2)列至第(4)列使用了204个都会区在推特发布前后一周(3月8日至23日)的观测值。结果显示,无论使用何种时间跨度,历史排华强度在推特发布后都对“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3)列和第(4)列依次添加了州与日期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所有控制变量与日期固定效应的交互项。控制了全部交互项之后的第(4)列结果显示,当历史排华强度增加1个标准差时,两种标准化的搜索指数将分别增加0.20和0.23个标准差。

由于西部的排华事件远多于东部,为了确保结果不会受到分布偏度的影响,第(5)列中使用11个西部州的都会区作为样本,第(6)列把样本限制在3个历史华人聚集最多的西海岸州,第(7)列使用发生过至少一次排华事件的都会区作为样本,并均采用与第(4)列相同的回归方程。第(5)列的估计系数虽然仅在20%的水平上显著,但点估计值与第(4)列非常接近,第(6)列和第(7)列的估计系数依旧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全部地区			西部州		西海岸州	历史排华地区
	3月15—16日			3月8—23日			
因变量	简单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 ×推特发布后	0.0535*** (0.0171)	0.0846*** (0.0131)	0.0722*** (0.00733)	0.156*** (0.0308)	0.136 (0.0774)	0.104*** (0.00712)	0.819*** (0.0000)
观测值	408	3 264	3 264	3 264	560	288	192
R ²	0.695	0.592	0.672	0.714	0.814	0.888	0.978
都会区、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州×日期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日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因变量：	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 ×推特发布后	0.000779*** (0.000267)	0.00138*** (0.000196)	0.00142*** (0.000127)	0.00245*** (0.000501)	0.00221 (0.00124)	0.00192** (0.000380)	0.00259*** (0.00000)
观测值	408	3 264	3 264	3 264	560	288	192
R ²	0.694	0.587	0.666	0.705	0.816	0.889	0.973
都会区、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州×日期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日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注:列(1)中使用3月16日前一天和当天的观测值,其余列使用3月16日前后一周的观测值。列(5)中使用11个西部州都会区的观测值。列(6)中使用3个西海岸州都会区的观测值。列(7)中使用发生过排华事件的都会区的观测值。括号内为聚类在州层面的标准误。***、**、*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证明“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反映的是美国民众的排华态度,我们进行了安慰剂检验,考察其他词组在同时段的搜索指数是否与关键自变量相关。首先,为了排

除“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仅仅反映对特朗普推特的关注，我们使用了特朗普当天其他推特中提及的美国政界人名的搜索指数，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前国家安全局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特朗普在当日各条推文中对他们表达了批评或支持的强烈立场。⁷如果我们的结果仅仅反映了历史排华地区的居民更关注特朗普的推特因而受其影响去搜索相关资讯，那么对上述政界人名的搜索量也应增加。其次，为了说明搜索指数反映了排华态度而非宽泛的排外态度，我们使用了对另一大移民群体墨西哥及拉美裔移民的排斥性词汇“Mexican wall”（墨西哥移民墙）以及对华人的歧视性称谓“chink”（窄眼）。如果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反映的是当地民众的排华意识而非对移民的整体排斥，那么对“chink”的搜索量也可能会相应增加，而对“Mexican wall”的搜索量则不应受影响。

表4报告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第（1）列回归使用“chink”的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特朗普推特引发了对华人的负面态度而非中立的关注。第（2）列考察了“Mexican wall”的搜索指数，估计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说明推特引发的并不是对移民整体的排斥。第（3）列至第（5）列考察了上述政界人名的搜索指数，回归估计的系数均接近于零且不显著，说明并非是历史排华地区的居民更关注特朗普的推特。这一系列结果显示，“Chinese virus”的搜索指数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地区居民对中国和华人的负面态度。

表4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因变量	以下关键词的谷歌搜索指数				
	chink	Mexican Wall	Joe Biden	Chuck Schumer	Michael Flynn
	(1)	(2)	(3)	(4)	(5)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	0.0725*	0.0197	-0.0151	-0.0264	0.00621
×推特发布后	(0.0365)	(0.0631)	(0.0583)	(0.0436)	(0.0469)
观测值	408	408	408	408	408
R ²	0.667	0.682	0.710	0.663	0.720
都会区、日期固定效应州	是	是	是	是	是
×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回归中使用3月16日前一天和当天的观测值。括号内为聚类在州层面的标准误。***、**、*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三）平行趋势检验

该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假设是在特朗普发布推特之前，不同地区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应该与历史排华强度不存在相关性，即满足平行趋势。因此，我们进一步使用事件分析法（event-study approach）来考察平行趋势。回归模型如下：

⁷ 限于篇幅，相应推特原文可参见作者个人网页（<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ngliu/research>）提供的附录。

$$Index_{ist} = \alpha + \sum_{\tau=-7}^7 \beta_{1\tau} Expul_{is} \times I(DaysSinceTweet_t = \tau) + \sum \beta_{2i} Controls_{is} \times Date_t + \gamma_s \times Date_t + \theta_i + Date_t + \epsilon_{ist},$$

其中 $I(\cdot)$ 为示性函数; $DaysSinceTweet_t$ 代表了第 t 日相对事件日期 (3 月 16 日) 的天数, 正值代表之后, 负值代表之前; 其余变量与此前模型中的含义相同; 因此, 系数 $\beta_{1\tau}$ 衡量了每天历史排华强度对搜索指数的影响。如果平行趋势成立, 那么 $\beta_{1\tau}$ 的估计值在 3 月 16 日之前 (即 $\tau < 0$ 时) 应接近零且不显著。

图 2 绘制了 $\beta_{1\tau}$ 的估计值和 95% 置信区间, 上下图分别使用简单和加权标准化的搜索指数作为因变量。在特朗普发布推特之前, $\beta_{1\tau}$ 的估计值均接近零且几乎都不显著, 即历史排华强度和 “Chinese virus” 搜索指数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而在推特发布后, 历史排华程度和搜索指数出现了显著的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双重差分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 即特朗普推特触发了历史排华经历对 “Chinese virus” 搜索量的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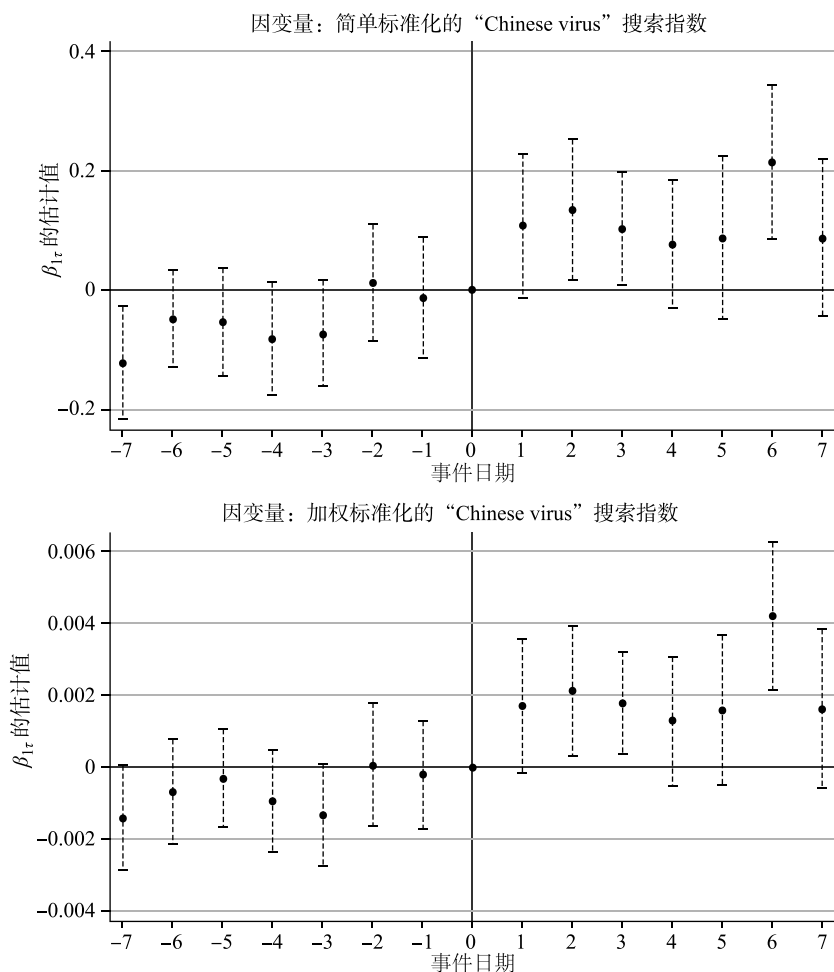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注: 该图绘制了事件分析法回归模型中 $\beta_{1\tau}$ 每个日期的点估计及其 95% 置信区间。

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进一步表明了历史排华地区居民已有潜在的排华观念，当特朗普推特将新冠疫情与中国相联系，为“Chinese virus”这一表述赋予排华意义之后，他们的排华态度受到了触发，并以“Chinese virus”搜索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四）排华观念存续的影响因素

为何百年前的排华经历对当代美国社会产生了长期影响？通过对地区按特征分类的异质性分析，我们探索了影响排华观念延续性的社会经济因素。在双重差分模型里，我们添加地区特征与关键变量（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推特发布后）的交互项，考察地区特征是否会影响历史排华的持续程度。由于地区特征在长期中会发生变化，我们根据各地区历史和现代特征分别构建了独立的虚拟变量。

表5报告了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第（1）列报告了加入关键变量与高亚裔比例地区交互项的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我们分别将1880—1940年间和1960—2010年间平均亚裔人口比例高于中位数的都会区定义为“历史高亚裔比例地区”和“现代高亚裔比例地区”。结果显示，“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发布后”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与历史高亚裔比例地区的交互项接近零且不显著，而与现代高亚裔比例地区的交互项为负向显著。这表明，历史上亚裔人口比例对排华态度持续性的影响不大，但现代亚裔较多地区的排华态度明显减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排华期间华人不得不“抱团取暖”，与其他群体交流互动的机会较少，因此这段时期内华人比例对排华态度持续性的影响有限；而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环境趋于开放，各族裔群体增进交流，偏见随之减少，所以在现代亚裔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排华观念的长期持续性也有所减弱。这一发现说明，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交流在长期能够消除偏见和排斥情绪。

表5 排华观念在不同地区的持续强度

因变量	简单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1)	(2)	(3)	(4)	(5)	(6)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 ×推特发布后	0.461** (0.219)	0.494*** (0.0823)	0.161*** (0.0286)	0.00982** (0.00382)	0.00890*** (0.00157)	0.00258*** (0.000467)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 发布后×历史高亚裔比例地区	0.0351 (0.140)			0.000536 (0.00228)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 发布后×现代高亚裔比例地区	-0.336* (0.167)			-0.00787*** (0.00285)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 发布后×历史低收入地区		-0.524** (0.218)			-0.00971** (0.00380)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 发布后×现代低收入地区		-0.334*** (0.0681)			-0.00637*** (0.00131)	
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 发布后×中国进口高冲击地区			0.299*** (0.0946)			0.00463*** (0.00138)
观测值	3 264	3 264	3 264	3 264	3 264	3 264
R ²	0.716	0.716	0.715	0.707	0.707	0.706

(续表)

因变量	简单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		
	(1)	(2)	(3)	(4)	(5)	(6)
都会区、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州×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本表的回归模型是在双重差分模型中加入“每百万人排华事件数量×推特发布后×相应地区虚拟变量”和“推特发布后×相应地区虚拟变量”。每列回归中均使用3月16日前后各一周的观测值。括号内为聚类在州层面的标准误。***、**、*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第(2)列报告了加入关键变量和低收入地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我们将1880—1940年间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地区和2010年贫困率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分别定义为“历史低收入地区”和“现代低收入地区”。结果显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收入较低的地区，排华态度的持续性都更弱。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低收入地区社会流动性较低，社区居民的接触比较密切(Hochschild, 2016)，而高收入地区人口流动性大且容易产生居住隔离(Cutler et al., 1999)，族裔之间的接触反而可能更少，因而导致了排华态度的长期延续。

第(3)列报告了加入关键变量和中国进口高冲击地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由于美国受到中国商品进口的冲击源自90年代之后，因此我们仅将1999—2007年间受到中国进口冲击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中国进口高冲击地区”。结果显示，进口高冲击的地区表现出了更强的排华态度持续性。结合第(2)列，我们认为经济状况本身不是影响排华持续的决定性因素，仅当地区的经济衰落被人为归咎于中国时，历史排华态度才容易死灰复燃。

第(4)列至第(6)列将因变量替换为加权标准化的“Chinese virus”搜索指数，回归结果与第(1)列至第(3)列基本一致。在未报告的回归中，我们也将样本按照受教育程度、失业率、基尼系数等其他特征进行分组后加入交互项进行估计，但没有发现显著结果。

为了佐证定量分析，我们搜集了美国媒体对相关事件的大量报道，定性讨论当下不同地区居民的对华态度及其成因。这些报道来自三类媒体：全国主流媒体；加州主流媒体，特别是当下华人较多地区（如旧金山、洛杉矶）的媒体；历史排华较多但当下华人分布较少地区（如尤里卡、奇科和塔科马）的媒体。⁸

我们发现，全国性媒体大都以中立或批评的立场报道特朗普引发的排华态度。有报道引用了华裔社区领袖的访谈，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加州主流媒体也对疫情之后亚裔面临的歧视表示关切；接受采访的非华裔居民希望能帮助华人渡过难关。在有历史排华传统且当下华人较少的区域，当地居民的反应则更为多样：有读者撰文反对“Chinese virus”这一歧视用法；但也有读者认为，反对“Chinese virus”是小题大做。由于美国地区报纸在报道时会考虑当地的政治倾向(Gentzkow and Shapiro, 2010)，这些报道的

⁸ 限于篇幅，媒体列表和相关报道来源均可参见作者个人网页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ngliu/research>) 提供的附录。

态度表明在当下华人较多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支持华人的诉求；而在有历史排华事件发生且华人分布较少的区域，当地居民与华人的接触较为匮乏，更容易漠视华人的处境，或是受到政治宣传影响而对华人持有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负面态度。

五、结 论

本文考察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排华行为如何影响当下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我们使用时任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中将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这一事件，整合历史档案数据和谷歌搜索数据，定量识别历史排华事件和“Chinese virus”搜索量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在特朗普发布推特后，历史排华事件较多地区的居民会更频繁地搜索“Chinese virus”。本文通过一系列检验论证了“Chinese virus”的搜索量可以有效衡量当今美国民众的负面对华态度。这表明历史排华会对美国民众当下的对华态度产生持续性影响。

本文通过异质性回归和定性分析考察了影响历史排华长期持续的因素。当本地的经济衰落和萧条被人多地归咎于中国时，历史排华态度更容易延续。同时，这一延续性在亚裔居民较少的地区更为强烈，说明排华的持续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华人接触的匮乏。这一发现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种族和文化群体的多元化并不必然引发更激烈的敌视和矛盾；恰恰相反，不同群体之间的充分接触交流对弥合人为因素造成的群体隔阂有着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Alesina, A., and P.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53 (4), 898-944.
- [2] Anderson, D. M., B. Crost, and D. I. Rees, “Do Economic Downturns Fuel Racial Animu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0, 175, 9-18.
- [3] Autor, D.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121-2168.
- [4] Bisin, A., and T. Verdier,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1, 97 (2), 298-319.
- [5]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019, No. 26567.
- [6] Carter, S. B., “Embracing Isolation: Chinese American Geographic Redistribution”, Mimeo, 2013.
- [7] 曹春方、夏常源、钱先航, “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 《管理世界》, 2019年第1期, 第179—191页。
- [8] Cao, J., Y. Xu, and C. Zhang, “Clans and Calamity: How Social Organizations Saved Lives During China's Great Fami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2, 157, 102865.
- [9] 陈斌开、陈思宇,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经济研究》, 2018年第3期, 第35—49页。
- [10] Chen, S., and B. Xi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20, No. 13647.
- [11] Chen, J. J., “The Impact of Skill-Base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Journal*

- of Human Capital*, 2015, 9 (3), 298-328.
- [12] Cutler, D. M., E. L. Glaeser, and J. L. Vigdo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Ghett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 (3), 455-506.
- [13] 丁从明、吉振霖、雷雨、梁甄桥,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 基于城市圈的视角", 《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11 期, 第 148—164 页。
- [14]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 "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18 年第 2 期, 第 579—608 页。
- [15] Dustmann, C., and I. P. Preston, "Ra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Attitudes to Immigration",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 (1), 1-41.
- [16] 冯晨、陈舒、白彩全, "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 制度差异, 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 《经济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第 146—163 页。
- [17] 高超、黄玖立、李坤望,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管理世界》, 2019 年第 2 期, 第 43—57 页。
- [18] 高翔、龙小宁, "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经济学》(季刊), 2016 年第 1 期, 第 647—674 页。
- [19] Gentzkow, M., and J. M. Shapiro, "What Drives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US Daily Newspapers", *Econometrica*, 2010, 78 (1), 35-71.
- [20] Glaeser, E. 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 (1), 45-86.
- [21] Giuliano, P., and N. Nunn, "Understanding Cultural Persistence and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1, 88 (4), 1541-1581.
- [22] Grosjean, P., "A History of Violence: The Culture of Honor and Homicide in the US Sou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4, 12 (5), 1285-1316.
- [23] Hainmueller, J., and D. J. Hopkin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17, 225-249.
- [24] Hainmueller, J., and D. Hangartner, "Who Gets a Swiss Passport?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mmigrant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107 (1), 159-187.
- [25] Hochschild, A. R.,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The New Press, 2016.
- [26] 黄玖立、刘畅, "方言与社会信任", 《财经研究》, 2017 年第 7 期, 第 83—94 页。
- [27] Kuhn, 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 [28] Lai, H. M., G. Lim, and J.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 [29] Lew-Williams, B.,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0] 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 U 型模式", 《经济研究》, 2015 年第 10 期, 第 134—146 页。
- [31] 刘毓芸、戴天仕、徐现祥, "汉语方言、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 《经济学》(季刊), 2017 年第 4 期, 第 1583—1600 页。
- [32] Lu, R., and Y. Sheng, "How Racial Animus Forms and Spreads: Evidence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2, 200, 82-98.
- [33] McClain, C. J.,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34] Müller, K., and C. Schwarz, "Fanning the Flames of Hate: Social Media and Hate Crim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1, 19 (4), 2131-2167.
- [35] Pfaelzer, J., *Driven Out: Roundups and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in Rural California*. New York: Random

- House, 2007.
- [36] Ruggles, S., S. Flood, R. Goeken, J. Grover, E. Meyer, J. Pacas, and M. Sobek, IPUMS USA: Version 10.0 [dataset]. Minneapolis, MN: IPUMS, 2020.
- [37] Scheve, K. F., and M. J. Slaughter,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Over Immigration Polic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83 (1), 133-145.
- [38] Sniderman, P. M., P. Peri, R. J. de Figueiredo Jr, and T. Piazza, *The Outsider: Prejudice and Politics i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9] Stephens-Davidowitz, S., “The Cost of Racial Animus on a Black Candidate: Evidence Using Google Search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4, 118, 26-40.
- [40] Voigtländer, N., and H. J. Voth,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 (3), 1339-1392.
- [41] 王艳、李善民, “社会信任是否会提升企业并购绩效?”, 《管理世界》, 2017年第12期, 第125—140页。
- [42] Zhang, C., “Family Support or Social Support? The Role of Clan Cultur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9, 32 (2), 529-549.
- [43] Zhang, C.,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0, 48 (1), 100-123.
- [44] 张川川、马光荣, “宗族文化, 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 《世界经济》, 2017年第3期, 第122—143页。
- [45] 张川川、申广军、陈斌开, “儒家文化与家庭创业”,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 2019年。

From “Chinese Must Go” to “Chinese Viru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Sinophobia in the United States

LIU Cong XIE Bin* BO Shiyu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 study the long-term effect of historical anti-Chinese incidents on curren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an unexpected diplomatic event—President Trump referred the coronavirus as “Chinese virus”—as an exogenous shock, we combine historical archives with daily Google search data to conduct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idents in regions that witnessed more historical anti-Chinese inci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Chinese virus” in Google search toda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ersistence of Sinophobia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lower Asian population share.

Keywords: cultural persist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dia

JEL Classification: F50, N42, Z10

* Corresponding Author: Xie Bi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No. 601 Huangpu Avenu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Tel: 86-20-85225001; E-mail: xiebinecon@outlook.com.